

古田会议纪念馆文稿



苏区历史 和精神研究

傅柒生 主编

古田会议纪念馆

 中共党史出版社

古田会议纪念馆文稿

苏区历史和精神研究

傅柒生 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区历史和精神研究 / 古田会议纪念馆编. --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098-2377-4

I. ①苏… II. ①古… III. ①中央革命根据地—文集 IV. ①K269.4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42281 号

责任编辑 贾京玉 于国宁 (特邀)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 编 100080
网 址 www.dscbs.com
印 刷 福建省龙岩市海得宝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字 数 193 千字
印 张 7.5
印 数 1-2000 册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2377-4
定 价 25.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单位联系
电话: 0597-2290825



目 录

- 刍议苏区精神 吴锡超 (001)
- 中央苏区：客家革命精神的光辉实践基地 傅柒生 (007)
- 略论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内涵、形成
及其时代意义 陈发来 (023)
- 苏区干部好作风的传承与实践 陈小英 傅柒生 (033)
- 苏区干部好作风与当前领导干部作风建设 陈杭芹 (045)
- 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概述 傅柒生 (052)
- 《红色中华》与中央苏区的反腐败斗争
..... 傅柒生 赖文燕 (060)
- 福建苏区廉政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陈杭芹 (070)
- 红军长征前后我党的工会工作方针和特点概述
..... 曾宪华 (081)
- 中央苏区干部队伍建设探微 陈发来 (092)
- 我军最早军报考 吴锡超 (104)
- 中央苏区报刊概述 傅柒生 (111)
- 中央苏区的扫盲运动浅述 傅柒生 (120)
- 才溪苏区是中共早期探索实践执政理念的典范
..... 陈杭芹 (132)
- 闽西：共和国法制从这里走来
..... 吴锡超 廖松福 蓝松金 王江龙 (140)

● 苏维埃共和国有法可依的新时代 ——以闽西苏区司法审判实践为视角	蓝松金 (167)
● 闽西——红色税务的发祥地	游宝富 (176)
● 在炮火中艰难前行 ——闽西苏区民生建设探微	陈发来 (182)
● 闽西苏区教育：共和国教育“总预演”	吴锡超 陈建生 蓝松金 (191)
● 闽西苏区青年运动的历史分期	吴锡超 (210)
● 闽西苏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	陈发来 (219)
● 苏区杭武县建置时间与首任县苏维埃主席 的考辨	曾宪华 (229)
后记	(234)

刍议苏区精神

吴锡超

2005 年至今,国防大学教授黄宏少将主编了“弘扬革命精神系列丛书”,并在书中注明该丛书包括《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古田精神》、《沂蒙精神》、《红岩精神》、《张家港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 9 本。

笔者是闽西人,也在福建古田从事党史研究工作,当然也为家乡的革命精神能够被党史权威推崇而感到自豪。但是,从弘扬民族精神和开展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中国“革命精神”系列里没有伟大的苏区精神是一个不完整的。

一、苏区精神的提出

早在 2001 年,江西著名党史专家余伯流、凌步机在合著《中央苏区史》时,最早使用“苏区精神”这个概念,并对其基本内涵作了初步的阐述。2003 年 12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江西考察工作时指出,苏区精神是我们党在革命斗争的艰苦岁月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是我们党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是宝贵的精神财富。^{〔1〕}这些,都说明苏区精神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人文心理形态。

开篇曾提到,黄宏教授版的中国“革命精神”系列没有包括苏区精神,其实,另一位著名的教授版的中国“革命精神”系列也没有包括苏区精神。

2006 年 8 月,中共江西省委讲师团团长李江源教授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了《党魂——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赞》一书,并在《党

史文苑(学术版)》2006年10期刊发了论文《论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文中列举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14种。^{〔2〕}

笔者曾经详读他们的著作，赞同他们关于“革命精神”的立论；同时认为也许是缺乏苏区精神的资源信息，或者是苏区精神的研究刚刚起步不久而“藏在深闺无人知”等缘故，他们没有将苏区精神列入其中；更认为，作为人文心理状态的精华，中国的“革命精神”系列中应该有苏区精神的一席之地。

二、苏区精神的立论标准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可以说，立论标准正确与否，是一种精神能否站得住脚的前提。目前，各种说法的“精神”都有，似是而非，良莠不齐。笔者认为，革命精神首先是一种优秀的人文精神，必须有一定的内涵，必须有进步的人文精神的共同点和自己的特点，必须代表了那一个时代的先进的人文心理倾向，必须有一定的影响。

因此，优秀的人文精神的立论标准可以按照历史事件（如长征精神）、杰出人物（如雷锋精神）、特定地域（如延安精神）、精神风貌（如载人航天精神）分为四类。与其他“精神”概念相比，苏区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同时具备了特殊的时间和空间，其“精神”的立论标准是根据特定地域来确定的，跟井冈山精神可以视为同一类型。

三、苏区精神的形成过程

任何精神体系的产生都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3〕}伟大的时代必将造就伟大的精神。苏区精神的产生和

形成也不另外，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包括特定的时代条件、社会条件、理论条件、阶级基础（物质基础）和实践基础。

我们立论苏区精神，首先要看苏区的革命实践究竟有哪些主要内容，否则，就是纸上谈兵。

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在给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中提出，红军的根本任务是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自身组织；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同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重大的任务，并将三大任务教育作为红军政治训练的重要内容。^{〔4〕}

红军的三大任务，也基本上概括了苏区的革命实践：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工农武装，进行土地革命，成立苏维埃政府，进行苏区全方位的建设。这是所有苏区存在的普遍现象。而苏区精神就是在这些革命实践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的高度提炼和抽象概括。

四、苏区精神的基本内涵

苏区革命实践决定了苏区精神的内容。苏区精神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文精神系统，主要有以下三大方面：

1、不畏强权，敢于斗争的革命传统

大革命失败以后，一片白色恐怖笼罩着全中国。但是，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和不畏强权、敢于斗争的革命传统使中国共产党人从血泊中顽强地站起来，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南昌起义打响了第一枪；“八七”会议进行了总动员；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如火如荼；打破了四次反革

命“围剿”；长征前夕，工农红军发展到30多万人。

历时两年的长征，红军转战14省，平均日行军37公里，渡过大河有22条，翻越的大山有20座，攻占县城100余座。而中央红军突破敌军四道封锁线，血战湘江，突破乌江天险，智取遵义城，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白雪皑皑的夹金山，穿过茫茫的草地，激战腊子口，会师吴起镇，由86000余人锐减到1936年10月三大主力会师时的30000余人，何其悲壮！

可以说，正是不畏强权，敢于斗争的革命传统，才使中国革命的火种不至于熄灭。历史已经证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注重调查，联系群众的干部作风

在苏区形成期间，苏区军民多次对攻打中心城市的错误做法进行了抵制；在遭受挫折后能适时改变，作出正确决策；在土地革命、肃反等斗争中改变一些“左”的做法，按照实际情况来开展，特别是注重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亲自开展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和才溪乡调查，为土地革命提供依据，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⁵⁾和反对“本本主义”⁽⁶⁾的著名论断。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闹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⁷⁾这首脍炙人口的山歌，传遍苏区，正是当年苏区干部优良作风的真实写照。

当时的苏区军民，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优秀共产党员人的领导下，形成了注重调查、联系群众的干部作风，涌现了“中央苏区模范县”江西省兴国县、“中央苏区第一模范乡”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等不少模范县、区、乡，得到苏区人民的衷心拥护。

3、治国理政，注重建设的执政理念

苏区军民不仅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不仅善于建设一个新家园。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8〕}中国共产党人带领苏区广大军民怀着这样的爱国情感，不怕流血牺牲，不畏艰难险阻，英勇反抗腐朽的反动统治，建立自己的红色中国，打破敌人残酷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如前文所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遍布全国 10 个省 231 多个县，总面积约 20 余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1910 万。1931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我们党开始了建立全国性红色政权的一次伟大尝试。它不仅为以后各个历史时期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新中国的政权建设积累了经验，而且在当时就开始了治国理政、注重建设的执政理念的具体实践。

除了频繁的革命战争，苏区军民还进行各级苏维埃政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成立和运转，开展党的建设、土地革命、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军事建设、法制建设以及社会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建设，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中央苏区的赣东北省委、兴国县委、长冈乡苏、才溪乡苏都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9〕}，受到了毛泽东同志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表彰。这既是当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央苏区提出的“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10〕}的极大成功，更是苏区精神内涵中执政理念的伟大胜利。

即使是在长征结束顺利达到陕北以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局势，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审时度势，始终秉承“治国——爱国”的理念，不计前嫌，最终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

综上所述，苏区精神包括了不畏强权，敢于斗争的革命传统；注重调查，联系群众的干部作风；治国理政，注重建设的执政理念这三大方面的内容，是民族精神在 20 世纪 20 ~ 30 年代的苏区那个特殊环境的集中体现，成为我党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我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强大政治优势和思想武器，成为中国革命精神系列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影响了整整一个

时代，对当时乃至今后的革命历程产生深刻的影响。

苏区精神形成于苏区肥沃的革命实践土壤，又支撑着苏区军民挺过严峻的白色恐怖、突破重重的经济封锁、打破残酷的军事“围剿”、完成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把握复杂的革命形势、应对多变的国际国内局势。它与井冈山精神、古田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因此，任何溢美之词用于苏区精神都不为过。

注释：

(1) 许军《开创宣传工作新局面——肖毅陪同李长春在瑞金考察》，《赣南日报》2003年12月16日第一版。

(2) 李江源《党魂——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赞》，重庆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目录。

(3)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中央编译局编译，中华书局2003年2月版。

(4)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5) (6) (9) (10)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7) 中国作家协会江西分会编《红色歌谣》，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

(8) 杜甫《春望》，蘅塘退士（清）编《唐诗三百首》，中华书局2006年1月出版。

中央苏区：客家革命精神的光辉实践基地

傅柒生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毛泽东等人领导了卓有成效的土地革命斗争，建立和发展了中央苏区等革命的根据地，从而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土地革命和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三大运动，而且土地革命成为最成功最伟大的一次革命运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在土地革命中，毛泽东、朱德同志直接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通过对起“最重要的作用”的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作历史考察，不难得出结论，土地革命战争与客家——中华民族的一支重要民系有着重大关联，具有开拓进取和英勇革命精神的客家人成为这场革命运动的重要参与力量，使得客家的革命精神在土地革命历史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诠注和解读，特别是中央苏区成为了实践客家革命精神的最重要基地。

首先，中央苏区是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最核心和最重要的区域，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这个大本营正是客家大本营的重要部分，使客家革命精神天然地渗透在中国土地革命的全过程。

中央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全国十多块革命根据地中最重要的一个革命根据地，它不仅地盘最广，版图最大，而且影响最大，它是全国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领导中枢，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和中心区域。红都瑞金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府，也曾是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苏维埃

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等中央级的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

1930年10月24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指出：“我们现在确定湘鄂赣联接到赣西南为一大区域，要巩固和发展它成为苏区的中央根据地。”“中央政治局便决定在中央苏区立即设立中央局，目的在指导整个苏维埃区域之党的组织，同时，并在苏区成立军事委员会以统一各苏区的军事指挥。”⁽¹⁾这是中共中央文件中最早正式提出“中央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的概念和区域，也明确了中央苏区的重要地位。

中共中央决定把湘鄂赣苏区和赣西南苏区划定为中央苏区，但实际上这两块苏区始终没有连成一片，中央苏区实际只有赣西南苏区，辖34个县，“有四百万有组织的群众”。⁽²⁾1931年4月，中共中央又决定把闽粤赣（闽西）苏区划入中央苏区，当年7月，根据中央指示，江西省赣江以西各县苏区归新成立的湘赣省管辖，赣江以东的赣东南苏区归中央苏区江西省管辖。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宣告成立，中央苏区正式形成。中央苏区辖有29个县，总面积约为7万平方公里，人口总数约为340万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至1933年秋，中央苏区进入鼎盛时期。中央苏区比较固定的组成县主要有24个：今江西省境内的瑞金、兴国、宁都、于都、广昌、石城、会昌、寻乌、安远、信丰、黎川、上犹、崇义；今福建省境内的龙岩、上杭、永定、长汀、连城、宁化、清流、归化（今明溪）、泰宁、建宁、武平。⁽³⁾

中央苏区所在地也是客家人的重要聚居地。闽、粤、赣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区，即闽西南、赣东南和粤东北正是孕育客家民系的“客家大本营”。赣南有赣江，闽西有汀江，粤北有梅江。千百年来，滚滚的赣江、滔滔的汀江、奔腾的梅江浇灌着三江两岸的沃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客家子民，流淌着瑰丽奇特的客

家文化，而赣江、汀江、梅江等“三江文化”又打造构筑了客家大本营，孕育生成了客家精神。客家大本营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以五岭为界，可以分成两个区域：五岭以北的赣南和闽西为一个区域，五岭以南的粤东北为一个区域。两者都是典型的山区，但前一个区域都属于亚热带山地性气候，天气温暖，雨量充沛，适于人居生活生产。赣南与闽西之间虽在武夷山相隔，但两地交通十分便利，水陆交通把两地联为一体，使之成为客家民系孕育、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地域，也使得这里成为中央苏区，并在这里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和游击战争具备了天然的良好条件。

客家人口分布，根据陈运栋教授的说法，广东 1500 万人，福建 400 万人，江西 500 万人，三省之和占了全国客家总人口 4000 万的 60%。罗香林教授认为，全国只有闽、粤、赣三省才有纯客家县，共计 33 个，而闽粤赣三省结合部的纯客家县就占了 29 个，即占总数的 90%。现代学者吴福文先生经过认真调查考证，认为中国纯客家县市有 41 个，分布在江西、广东和福建三省，并主要集中在赣粤闽三省交界。其中江西的纯客家县市有 18 个：赣县、南康、信丰、上犹、大余、崇义、安远、龙南、全南、定南、宁都、于都、兴国、瑞金、会昌、寻乌、石城、铜鼓；广东有 15 个：梅州、梅县、大埔、蕉岭、平远、兴宁、五华、紫金、龙川、和平、连平、翁源、始兴、仁化、英德；福建有 8 个：长汀、宁化、清流、明溪、连城、上杭、武平、永定。⁽⁴⁾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些纯客家县全部飘起来过革命的红旗，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区域，其中许多成为了中央苏区的组成部分，谱写了由客家人和非客家人在这些客家地区演绎的一段又一段光辉的革命历史篇章。

其次，领导中央苏区土地革命斗争的主要领导者多是客家人，活跃在中央苏区的“朱毛红军”是中国革命的一面旗帜。中央苏

区的土地革命斗争成为客家革命精神完美展现的伟大实践。

中央苏区是一块光荣的红土地，藏龙卧虎，精英荟萃。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和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都在中央苏区工作战斗和生活，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任弼时、张闻天、董必武、林伯渠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在这里留下过战斗和生活的足迹。从中央苏区走出来了共和国的9位开国元帅、7位大将、34位上将、106位中将、440位少将以及大批治国安邦之材。瞿秋白、何叔衡、贺昌、毛泽覃、刘伯坚、万永诚、古柏、王良等无数英烈还捐躯在中央苏区的红土地上。

大浪淘沙。客家民系形成的漫漫历史长河，淘炼了一批又一批大有作为、青史流芳的客家英杰。时势造英雄，土地革命战争也造就了许多客家英雄人物，他们在土地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客家优秀儿女身上所秉承的客家精神流露到时代所突显的革命精神上来，而且经过二者紧密融合互动，更加突显出客家精神的革命意义，表现出中国革命的客家风以及客家精神的革命经典。

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主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支持的中国工农红军，而“朱毛红军”又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军。1928年5月，在井冈山砦市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这是我党独立领导成立的第一支军级建制的革命武装，是中国革命的一支核心武装，也是中国革命的一面旗帜，“成为全国红军中的骨干和核心，从而进一步发展了井冈山的斗争，奠定了中国红军和中国武装革命的基础。”^{〔5〕}“朱毛红军”实际上成为中国红军的一个代名词，“朱毛红军”的二“巨头”都是客家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领导者，祖籍江西吉安，

明朝洪武十三年，韶山毛氏始祖毛太华曾参加了明太祖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运动，年老后移居湖南湘乡县，其子孙在韶山繁衍。因此，专家考据毛泽东是客家人。朱德被誉为中国红军之父，也是客家人，仪陇朱氏由福建上杭紫金山脚下瓦子街迁广东韶关开基（亦有资料说是嘉应州五华县），清嘉庆时随“湖广填川”的洪流迁居仪陇，世代为地主耕种。朱德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朱德用仪陇话可以和讲纯正客家话的叶剑英通畅交谈。那么，因为“朱毛红军”的辉煌历史，也因为毛泽东和朱德的丰功伟绩和人格魅力，客观地不容置疑地证明了客家人在中国红军建设及其在中国革命历史上重要的领导和支配作用。“朱毛红军”还有许多将领特别是中下层领导干部是客家人，他们在“朱毛红军”中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比如：红四军参谋长朱云卿是广东梅县客家人，红四军第三十二团团长袁文才系宁冈县客家人，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傅柏翠是上杭客家人，党代表张鼎丞是永定客家人，红一军团参谋长陈奇涵和红一军团组织部部长、少共国际师政委肖华都是兴国客家人，红一军团第十二师参谋长赖传珠是赣县客家人，红一方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是梅县客家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古柏是寻乌县客家人，红一方面军第二师政委刘亚楼是武平客家人。

客家人在聚集于客家大本营的艰辛迁徙过程中，付出了比其它民系更多的代价和汗水，培养出了坚忍不拔、吃苦耐劳、开拓进取、爱国爱乡、团结互助的革命精神，特别是为了得到梦寐以求的土地和自由，他们更是体现出强烈的反抗和革命精神，这种精神使得客家人成为中华民族最具有革命倾向的群体之一，也使得客家人成为了中国革命的天然同盟军。“朱毛红军”是这一历史现象的最好例证之一。“朱毛红军”中的普通士兵，多数来自于赣南闽西的客家子弟。红四军除了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部队的